

社会组织赈灾行动

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主编：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社会组织赈灾行动

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

主编：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组织赈灾行动/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主编.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180-903-2

I. 社…

II. 北…

III. 社会团体-抗震救灾-概况-世界-2008

IV. D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7031号

书 名: 社会组织赈灾行动

主 编: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总 主 编: 付 涛

责任编辑: 王冠丽 刘海英 王 辉 王 含

责任校对: 王冠丽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65号(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63568136(编辑部) 010-64071400(销售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jjrbbjb@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骏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0-903-2

定 价: 15.00元

特别提示: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2008年，中国被记住的不仅有奥运会，也有“5·12”地震。2008年，对中国来说，“这是最美好的年代，这是最糟糕的年代”，不用重读狄更斯的《双城记》，我们在2008年的夏天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几个月。

在这个普遍收获的季节里，我们也来收获，这80页是我们的收获，更是所有参与抗震救灾的NGO的收获，集中于此与读者分享。

我们收获了团结，NGO集体亮相于国人面前，功能各异、行动有别的各NGO不计得失地聚合在一起，联合小组模式规模化呈现；

我们收获了友谊，十余家地区性网络结盟，这些少则几家、多则20余家的组织之组织，参与人数不可计数，结下了绵长的情谊；

我们收获了理性，NGO不再对各种渠道的多方限制发牢骚，“帮忙不添乱”、“有序参与 有效服务”的口号响亮而实用；

我们收获了认同，“同志”志愿者被普通群众认可，竹板、废砖搭建的生态厕所很受村民欢迎；

我们收获了观念，女性不仅是哭泣着的受难者，她们也是积极、有效的抢险者和救助者；

我们收获了信息，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集中将社会组织的财务问题抽丝剥茧的捋顺、厘清；

我们收获了经验，台湾建筑师带来生态厕所的理念，印度古吉拉特邦震后重建折射了政府、NGO和企业的交错与纠葛。

当然，我们也遭受了尴尬，有的NGO救灾之余还要面对来自各种职能部门的审查、盘问、甚至驱赶；

我们也深感困惑，民间组织该以什么方式介入突发性社会事件？组织化的NGO更有效，还是志愿者更实用？

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影响力局限，200多名街头受访公众中普遍知晓红十字会，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听说过“NGO”。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相信，最有价值的收获是反思本身，而以上这所有的收获、困惑都是反思。

奥运会如火如荼之时，我们的作者们完成了本书中关于地震救灾、重建的一系列反思。当媒体在用“隆重、辉煌、盛大、美轮美奂、无与伦比”来盛赞奥运时，我们的作者要写下“受难者、救济款”等字眼。这多少有些“分裂”的举动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所以我们真诚地感谢这些作者，无论他们身处灾区还是奥运的北京城，抑或隔海相望的异国他乡，因为你们的努力，本书得以面世。

传说以色列国王大卫王（公元前1011-前971年）手上有只戒指，上面刻着这样一行字——“一切都将过去”。如同奥运会过去，灾难也会过去。我们为欢乐聚会的消散而伤感，也会为深切灾难的远去而欣慰。无论如何，希望远去的是“5·12”刻骨的疼痛，留下的是志愿者的热情、灾后重建时NGO的身影、政策的进一步宽容与开放、公民社会性格的渐趋成熟……

目 录

NGO的集体亮相.....	1
——地震中的NGO联合行动	
聚合的18天.....	5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记录	
现场记录与行动反思.....	14
不同取向，同一种爱	
——成都爱白的救灾样本.....	14
功夫在诗外 有心柳成荫	
——成都野草文化生态项目经验分享.....	17
不可忽视的有机部分	
——云南草根组织的行动.....	19
时刻准备着	
——贵州民间抗震救灾联合行动记录.....	21
从紧急应对到专业规划	
——环境NGO在抗震救灾中的角色转换.....	25
NGO的成绩与尴尬.....	29
民间力量救灾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30
志愿者PK组织化NGO.....	31
女性只是受难者吗	
——灾害管理和社会性别.....	33
重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想象	
——台湾“社会建筑师”谢英俊访谈录.....	36
四川NGO赈灾现场交流会摘录.....	40
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与筹集.....	44
民间组织的财务透明与监督.....	48
管窥民间组织参与重建.....	52
NGO灾后重建行动及区域坐标.....	56
国际机构如何参与救灾.....	58
公众对NGO参与救灾认知调查.....	61
印度古吉拉特邦地震重建现场评估.....	66
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启示.....	72
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77
抗震救灾书目拾零.....	79

NGO的集体亮相

——地震中的NGO联合行动

◎ 王辉

浮出水面的NGO们集体亮相，在缺乏社会认可的环境下，用自己的实际或间接参与行动来表明NGO的身份以及拓展生存的空间。在震区救援行动中，NGO喷薄而出如火山岩浆，无往不前，又似秋熟的麦种，落地不死开始新生。

“反应及时，行动迅速”，冠以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其中，多样的NGO联合形态，各有差异，却又能形成互补。但在历次的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面前，“联合”一直是NGO们不敢多想的话题，既为体制所困，又为组织能力欠缺所致。

汶川地震，在紧急关头让这些组织丢掉“NGO”身份积极参与进来，并以“帮忙不添乱”的姿态宣告他们是“志愿者”，从而较为顺利完成了5·12紧急救援中的“NGO联合”。当然，在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联合”里面，一些话题仍存争议，且需要继续讨论。其中既有本土NGO发展必经的困惑，也有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此外，进入救灾的“临时安置”以及“灾后重建”阶段，NGO的联合是否可以得到延续？日常性的救灾或更长远的项目规划中，NGO能否将紧急期间的联合经验加以保留？除了NGO内部的联合，与社会大众、政府、企业又将发生怎样的关系。本文试着就这些涉及“NGO联合”的话题做一些观察和描述。

联合群谱

搭建联合平台，在短时间将大批的物资聚集起来，并有效的向灾区输送，最能体现NGO联合所能达到的效果。赈灾中NGO参与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建立平台、对外发布物资提供或紧缺信息，物资集中、运输和发放、反馈再跟进，甚至联合行动的办公中枢的协调，都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NGO迅速集合起来，并依托平台，最大限度发挥出各自机构的力量。

这种机构间的联合，好几个即在地震一发生后就立即开始行动。设在成都根与芽机构的“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以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为根据地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是最重要的两个机构联合体。

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主要是由4家民间组织发起，后来陆续有40多家参与进来，至整个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共有100家之多。据有关数据¹，经办公室向灾区输送的物资折合人民币计算，逼近1000

万元。这对NGO联合行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能力展示，也是对NGO在过去的重大事件中缺位的一种回应。

仅隔3天，同样在成都还成立了另一个联合体——“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参与者主要是在川国际NGO和在川有项目点的本土NGO。同样处在震区且受到影响的甘肃，当地的草根NGO也联合起来，并在救灾行动之初发布“援助5·12地震灾害甘肃草根联合行动小组评估报告”。

在四川之外NGO比较活跃的区域，也都将机构的各自优势进行整合，并表现在信息收集、资源筹集、物资运输等各救灾环节上。在北京，多家NGO、基金会共同发起名为“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呼吁各民间组织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同样，在陕西，陕西妇女研究会联合当地的其他9家组织，立即奔赴灾区现场进行救援。

1. 此数据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之报告。

这些在外围的NGO在联合之余，也积极与四川境内的组织或联盟性的组织取得联系，形成地区性网络，以民间协作的方式开展服务。据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对NGO进行的评估报告中指出，截至2008年6月3日，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当地开展服务的机构达到231家¹，其中以民间协作方式开展服务的地区性网络，就达到10个之多²。

有的NGO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协作性网络中，以“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为例，响应其倡议的组织虽多达100多家，但直接提供物资或志愿者协作的机构为40多家，其中有的组织或机构本身也是其他地区性协作网络的一分子。比如“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到目前为止有187家组织参与进来响应这个联合声明，但其中也有不少机构同时加入到其他地区性的网络中。

联合的突破

2008年6月20日在成都举办的NGO抗震救灾现场交流会上，与会NGO纷纷表示这次震灾救援是NGO的集体亮相，而不单单是某个单个机构的对外活动。不同使命的NGO形成地区性甚至跨地区联合，出现了不同的联合形态，或响应声明，或参与实际的救援，或提供信息网络支持，这些特征均凸显救灾中NGO进行联合的意愿和行动能力。

然而此前，在历次的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面前，尤其是面对年初的雪灾时，既为体制所困，又为组织能力欠缺所致，“联合”一直是NGO们不敢多想的话题。但突发的八级大地震，使得NGO再也不能坐等体制放松空间，而是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主动。有的组织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其他“合法”身份展开行动，如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四川圣爱基金会等，均利用红十字会的旗号前往灾区参与救援；也有组织打出“帮忙不添乱”的口号，为政府排忧解难，去政府的行政体系忽视或遗漏的地方，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抛弃成见，共赴救灾，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间放大自己的作为，表现了NGO的主动角色意识。

年初的雪灾救援中，NGO参与数量少，范

围小，甚至可以说在NGO圈内没有引起足够的影响，曾引发讨论和质疑。同时，NGO在反思的同时也在积累自身的能量。再溯及SARS期间，NGO尽管在应对和处理上，还未能表现出很强的应急响应和组织动员能力，但已通过行动和声音反映出公民自主行动参与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愿望。这种NGO参与社会事件的愿望，和希望在其中有所担当的突破，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通过零星的考验和积累，NGO一步一步走过来，最终得以在这次地震救灾中厚积薄发。

可以说，NGO联合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们参与这些灾难救援当中，而在于他们能否摒弃日常的种种差异而走到一起，共同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来。由单兵作战、散兵游勇到集团作战，逐步学会“联合”。正如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么大的灾害，如果中国万30多民间组织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不要再存在下去了”。在NGO数量庞大，理应有所作为之时，联合就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另一种解释：“联”而不“合”

从不同联合体的行动和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次抗震救灾NGO联合发挥了应有之义，展现了他们在灾难面前的积极应对和动员能力。尽管在公众看来，都是可喜的成绩，然而，NGO内部发出的不同声音，也告诉我们联合的艰辛与不易，“亮丽”的联合背后也夹杂着不同的色彩。

“联合，如果只‘联’不‘合’，那还叫‘联合’吗？”在抗震期间，担任四川联合办公室总协调的张国远，事后就临时办公室中NGO联合遇到的窘况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件的起因主要在于，张在进行协调联合之时，来自外界的捐款和使用经费都是经过张国远的个人账户，由于现金流过大，引起警方调查。尽管后来麻烦化解平息了，但令张国远不解甚至委屈的是，为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情，却得不到伙伴的理解，反倒引来更大的质疑声，认为警方的关注都是张国远招惹过来的。张的回应是，即使不是他来做

1. 其中北京60家，四川55家，上海、广州、贵州、陕西、重庆等超过10家。

2. 十余家地区性网络：NGO救灾联合办公室（24家），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28家），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10家），陕西民间组织联合行动（13家），重庆512抗震救灾民间救助中心（8家），甘肃草根联合行动小组（7家），厦门救灾援助行动小组（7家），上海新驼峰行动（5家），贵州民间救灾网络（18家），广东在粤川籍人士关爱行动（15家）。

总协调，这个联合办公室同样也会遭遇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这是个临时的机构，在救灾的非常时期，政府对这些钱的动向十分警惕。但他的解释并没有打消其他合作伙伴的顾虑甚至猜疑。

事分两面，张国远的伙伴也表达了他们对“联合”的看法。虽然联合办公室有不同的分工，但作为总协调的张国远时常根据自己的判断作为，而没有采用NGO惯用的“参与式方法”来征询伙伴之间的意见，而且开展联合行动时沟通不够，也没有一个决策行动的基准，比较随意。张国远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一些公开场合做了反思和自我批评。按照张本人的解释，在紧急情形下，负责运送物资到一线参与救人是大局，既然由他来做总协调，那么他就有权力做主去调配这些物资的去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下也容不得再去同联合伙伴一一商量再做决定，因为前线小组已经把灾情和需求反馈回来，他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立即做出反应，而不是把时间耗在讨论上面。

公婆都有理，但联合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下来。到5月30日完成紧急救援工作任务后，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依照事先的约定解散。根据外界以及办公室做出的自我评估，认为这次“联合”是有效的。但关于“联合”的争议却没有停止。

同样，笔者在与进驻到灾区的某省公募基金会的一位志愿者谈到机构联合时，他也对NGO的联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满。他表示，最主要的不满就在于资讯的不对等，尤其对省内结成的联盟性组织之间的资源分享不足，这导致了前往当地的分批小组之间的信息出现误差，这也是最可怕的。因为信息出现偏差不要紧，但最可怕的就是不交流，从而影响工作的可持续开展。对此，他解释为可能某些机构存有一点“私心”，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独有信息。此外，对于加入联盟的某些合作成员，该志愿者也表示失望，因为有的机构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参与，只是挂这个名而已。而打着联盟旗号做事的主导性NGO，有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冠以“联合”的旗帜已经亮出来，但真正能打多久？下次还会不会打？这的确值得NGO行动者进行反思。初次走向联合的NGO伙伴们，少不了要学会如何去联合，以及处理其间遇到的问题。

未竟的联合之路

踏上联合之路，恐怕是这次抗震救灾的最大收

获。NGO伙伴们通过这次“实战”见识了联合的巨大潜力，验证掂量了救灾联合路上的自己能做什么，怎么参与进入。不能否认的是大家在灾难面前学到了什么叫合作，经历了这样一次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NGO联合，仿佛接受了一次“成年礼”。

上文提到的联合办公室张国远本人与部分伙伴的摩擦，只是在共识下的不同见解而已，并没到让联合办公室在遇到困难时分崩离析。虽然是首次的“大联合”，NGO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在此过程中，一些细微之处仍值得我们去加以关注。

在紧急救援阶段，这些NGO都有清晰的目标就是参与救援，指示性很强，所以效果也较为明显。随着救援行动过渡到更长时间的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外界压力和来自灾区的需求也就相应缓和下来，从而针对性的工作就可能随之趋缓，出现干劲松懈、目标不够明确等问题。这个时候，建立新阶段的议事规则就显得更加迫切。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NGO群策群力，在“帮忙不添乱”的约定下，在“扮演政府拾遗补缺的角色”定位下，各个机构结合自身的使命和能力，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大联合体系下。有的去一线灾区需求调查，有的坐镇灾区外指挥协调资源的调配，有的发布灾情需求，有的运输物资，有的参与救灾的志愿者管理，有的记录NGO的参与情况并对之进行评估，不一而足，皆是对联合之名下的分工的不同诠释。陕西10家民间组织联合行动成员之一的陕西西部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助理向缘也提到，NGO在向web2.0过渡时，需要技术的明确分工，而不是一窝蜂去做一件事。同时他也提到在陕西10家民间联盟内部如果出现不同意见，相应的办法就是以运作该项目的机构为主导，也就是尊重该机构的意见。

上文提到的四川联合办公室的运行，涉及到一些沟通、决策机制以及议事规则的问题，甚至还包括需要考虑的风险问题，如募集捐款，都指明了NGO联合不是简单的1+1=2的数学题，而是一个为达成行动目标而进行的团体性协作活动。

相比四川联合办公室，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成立初，就将NGO联合中的议事规则制定作为重点考虑。到访时，笔者就曾发现该中心将地震之后每期的救援或重建进程计划、流程和须知贴在橱窗墙壁上，一目了然。而且每日的例会都有志愿者记录整理，并为来川的外省NGO提供信息支持。

而活跃在绵竹遵道镇的志愿者协调办公室，

则更像一个NGO的集中地和试验田。地震发生后，由友成基金会、深圳登山协会、万科志愿者和四海同心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机构。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协调各方力量在遵道镇当地开展救助以及后期的重建工作。有了万科企业和友成基金会的支持，这里一度成为灾区最为热闹的NGO聚集地。此外，该办公室还联合了在当地参加赈灾工作的陕西10家民间组织联合行动、北京农家女杂志社、仁爱关怀、北京自然之友等十几家民间机构以及包括灾区群众在内的个人志愿者。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NGO以协调办公室为基础，又在当地开展不同的项目，实施不同的机构计划。现在，重建工作归于平淡，趋于日常化管理，加之各个机构已经站稳脚跟并独立实施自己的项目，它们未来有可能脱离志愿者协调办公室。

题外之意的联合

除了NGO自身的联合，有时候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当地的社区与居民一起联动起来。

6月8日，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指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这不仅成为很多NGO开展重建工作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在规划重建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其实，政府与NGO的结合在条例出台之前，早在地震发生时就已经出现了。有的NGO想为灾区筹款但没有资格，于是与政府合作，借用红十字会公募资格进行募集；也有的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留在四川参与救援，直到后来的重建工作。其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更是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由于基金会的成员大多是企业家，所以基金会号召成员所属企业积极参与，如复新集团就积极捐赠药品。此外，友成还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牵线搭桥将绵竹市与众多企业家联系起来，希望通过企业的援助振兴绵竹市的经济。包括零点集团、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内的很多企业为之出谋划策。就连饱受争议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向全国人民道歉之后，承诺万科拿出1个亿来支援灾区的恢复重建。目前万科驻扎在遵道镇，同时还派出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具体工作。

紧急援助期间，NGO运送物资并与当地政府

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为一些NGO后期能够继续致力于灾区重建打下了基础。张国远在绵竹汉旺镇成立的NGO备灾中心就是很好的一例。同样，在彭州崇德村，邓华所在的贵州行动小组在地震期间的表现也给当地政府留下很深的印象，重建时他们也顺理成章的留了下来。

7月2日的《新京报》对遵道志愿者办公室的报道中提到，这些志愿者组织地震后来到遵道，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没有打着NGO的旗号，而是以“志愿者”或“民政义工”的身份介入进来，这也容易被政府接受。罗世鸿如是说。罗原是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的创办人。这些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包括镇政府在内的好评，有些人还被纳入到政府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这些NGO清楚在灾区重建的参与，政府仍居主导地位，他们自己的角色还是以配合支持为主，这也正应了NGO一开始达成的“帮忙不添乱”的共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收赈灾款物超过12亿元，为全面支持灾区灾后重建，中国红基会决定拿出2000万元捐款，面向国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其他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联合实施5·12灾后重建项目。目前，第一批已有5家民间组织中标。这也是官方背景的NGO（亦称GONGO）首次以较大规模资助本土草根组织的举措，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此外，震区中新生的板房区以及保留下来的村落，都可以是一个社区的载体，其中的居民也应是NGO需要联合的对象。紧急援助后面的临时安置、灾后重建的阶段，不是简单的房屋搭建或修缮、安顿居民恢复生产，而是在震区的原址（或迁移）基础上，重建居民对未来的期望，重建居民对家或是社区的某种归属感。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到，而正是NGO擅长所在，NGO可以发动居民参与到社区的重建、生活恢复、生产自救等环节上，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自我意识，而这些往往是政府的行政性命令所无法顾及到的遗漏之处。

灾后重建设定的时间表很长，这对NGO来说任重而道远。NGO在灾后重建，是以单兵方式参与，还是以联合介入，都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考验历程。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多少NGO继续参与进来？做得效果如何？我们将继续对灾后重建中的NGO给予持续的关注。

聚合的18天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记录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7分。

陆非，NGO发展交流网（NGOCN）负责人，正在办公室里看邮件，为将来的草根公益支持中心做准备。

张国远，当时还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正在北京开会，打算回成都后启动青少年发展教育项目。

水瓶，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财务兼麦田计划核心志愿者，刚刚开始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实习。

邢陌，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刚从昆明开会回到玉溪，像往常一样处理着学校的日常事务。

罗丹，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同样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

甘泉，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项目统筹，还在铜仁做着年初雪灾救助的后续工作。

安猪，“多背一公斤”负责人，正在北京盒子咖啡馆奋笔疾书，专心写他的项目规划。

……

一分钟以后，地动山摇，房倒屋塌，7万多生命消失，2000万同胞家园被毁，无数人的行进轨迹从此改变。这其中，也包括他们。

做点什么吧

和灾区以外很多地方的人一样，陆非最初并没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一场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的巨大灾难，还在继续干着自己的事儿。可到了晚上10点左右，死亡人数迅速从100多上升到8000，新闻报道不断说着挖人，挖人，陆非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坦白讲，真不知道为啥要行动，可能觉得人死得太多了吧。”可是，做什么，怎么做？这么大的灾

难，没有人经历过，没有机构能够独自面对，但如果不做点什么又寝食难安。

网络世界已经一片忙碌，以地震为主题的QQ群也出现了不少。NGO发展交流网被笑称为NGO界的CCTV，同行们都喜欢在这里交换信息，讨论问题。这一天，大家都不约而同来到这里，或者给陆非打电话，安猪也在MSN上问着同一句话：我们做点什么吧？

晚11点邢陌发了据他说也许是民间组织救灾的第一个帖子，问有没有组织前往四川救灾的，他报名参加，费用自理。“年初的雪灾对我们冲击挺大的，我们也没有行动，地震出来后，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报道，发现已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非常大的一次灾难，就不要自己去东跑西颠了，还是大家一起来做吧。”当然，这需要四川当地的机构为大家打前站，谁可以来做？

安猪推荐了张国远，陆非想到了罗丹。

身在北京的张国远接到陆非的电话，问有没有兴趣参与联合救灾，回答是：没问题。午夜12点多，罗丹一家正在男朋友家避难，因为自己家在七楼，他家在二楼。陆非说终于打通了你的电话，安全就好，接下来的问题：不打算做点什么吗？其实罗丹也在打算，可当时没想那么大，她的想像力还停留在自己的机构上。现在，陆非给她“安排”了协调的任务。

5月13日凌晨，一份由多背一公斤、NGO发展交流网、百蹊助学网、心守家园助学网、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等20家机构发起的倡议已经在网上出现——《紧急呼吁：呼请民间组织参与512地震援助行动》：



联合办公室仓库前的忙碌

我们紧急呼吁：处于灾区的民间公益组织，请收集当地受灾信息，联合当地的民间组织，与政府配合，协助政府开展赈灾工作；

我们紧急呼吁：在灾区有项目点，或有开展项目的民间组织，请登记所掌握的项目点受灾情况，在5·12地震灾害援助论坛上反馈，便于有条件的机构进入开展工作；

我们紧急呼吁：请有条件的民间组织，着手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开展重建工作。”

倡议书上，有专门设立的民间赈灾QQ群（25438771），关注受灾学校和孩子的“多背一公斤”专题网页（dizhen.1kg.org），以及NGOCN上的地震灾害救援行动论坛（<http://www.ngocn.org/bbs>）。这个论坛后来在联合赈灾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沟通功能，5月份发布主题信息300多条，各地民间组织行动的信息，迅速在此汇总。

而这份倡议书，后来签名回应的机构达到了100多家。这真是中国NGO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联合行动。

就这样成立了

听上去似乎很有气势，但其实最初，没有人知道要联合起来做什么，环保，助学，社区发展……大家所擅长的，跟地震初期的紧急状况都挨不上边。不管了，先动起来再说。

陆非在后方协调各方意见。罗丹要做的是了解需求信息和本土NGO情况，可第二天通讯依然不畅，她便一早跑去红十字会，搜罗到药品、棉被、橡皮手套等物资的需求，顺路找了个网吧上传（网吧在一楼，方便逃余震）。她说，后来很多伙伴发过来的第一批物资，都是因为看到了那个需求。

网吧里，罗丹得知四川这边的总协调是张国远，正在从北京飞往成都；负责跟政府协调的是《慈善》杂志臧路。在这次地震之前，他们几乎都不认识。

跟臧路联系上，罗丹听说团省委可以提供很大一间屋子给大家办公，还有地方贮藏物资，那是好事啊，正愁没有仓库呢。可下午赶去团省委，却没听出对方有这样的意思，直接把她当普通志愿者开始安排工作了。这让罗丹有点蒙。反正，开始总是乱乱的。

晚上7点，臧路联系到团省委的一个办公室开会。张国远乘坐的飞机进不了成都，落在重庆了，

正在从重庆赶来的路上，大家直到9点多才把他等来。正好到了团省委想当志愿者的薛启婵（香港社区伙伴成都办公室）和帕提古丽（曙光社区发展中心）听到消息，也懵里懵懂一起参加（后来她们和另一些NGO成立了另一个联合体“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简称5·12中心），事后才知道，当晚这些人就成立了“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而且背后，有着巨大的网络支持。

灾区的情况紧急，大家的心也急，一屋子人七嘴八舌，发现都不知道该怎么弄。想做的事情有好几样：除了挖人不太可能外，包括运送紧急物资、进行志愿者培训和管理。但大家能力有限，同时做几件事可能一样都做不好。而且，虽说是联合行动，但大家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协调？最后觉得，灾区现在需求最迫切的是物资，最容易介入的也是做物资援助，那就做这个吧。办公室定在根与芽，仓库设在根与芽楼下一个刚刚竣工的130平米的商铺。14日去谈时，本来想租用，人家一听用来放救灾物资，当即表示免费出借。

最后确定，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的执行机构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管理培训学院、麦田计划、贵州民间震灾救援联合行动小组，具体执行人员于14、15日陆续赶到：张国远总协调；罗丹管物资统筹，一位同事负责联系运输车辆；邢陌负责仓库和志愿者管理；水瓶联络麦田计划的物资，并于19日开始管理财务；甘泉为队长的贵州五人小组14日一早赶到，每天奔赴灾区了解信息，分发物资。

手忙脚乱

方向一确定下来，大家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第一批入库物资是根与芽众多项目小组募来的，罗丹和两个同事给各小组打完电话，那些学生和家长们就积极地忙活起来，在小区里募集衣服、水、方便面等。

5月14日，1.2万吨大米运到，24小时之内被送往灾区；联系到了5名固定志愿者负责物资整理、搬运等；有了仓库；筹集到现金15万（来自广东狮子会），价值23万的药品（来自成都本地一家医药公司），已由红十字会送至灾区；有了3个志愿运输车

队。

药品、手套、帐篷、水、奶粉……随时变化的物资需求信息不断地由前线小组从各个灾区发回。

办公室里一片繁忙，用罗丹的话说：座机手机小灵通，电话铃此起彼伏，每一个震灾管理QQ群，都不停地闪，前方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后来有媒体来采访，跟罗丹说不到两句话，她接了个电话就跑去仓库，弄得记者直发愣。罗丹开玩笑说，如果将来不做NGO了，就去应聘物流公司。

每天在办公室过夜的人都有十来个，而且只能睡三个小时；第一天晚上没有睡袋，就找些捐来的衣服往地上一铺。有时半夜2点多了还有货到，又得找志愿者下去搬货。每天进出办公室门的总有三四十人，罗丹总恍惚那还是不是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倒也不见外。

楼下的仓库，每天保持20多个搬运志愿者，包括去前线送物资的，这么些天加起来有300人次。每天晚上都安排4个志愿者守仓库。这些志愿者被邢陌管理得井井有条，虽然货量很大，平均每天都有约四五十万元的物资，但都按品种码放整齐。仓库里放不下了，就堆在外面，堆成长长的一排，看上去真是很壮观。

这么多人在联合办的吃住行，则是张国远需要操心的，虽然很多费用是志愿者自理，但也同样有压力，幸好狮子会提供了2万元行政费用。

紧急救援大家都是第一次应对，许多东西都是边做边完善。由于没有熟悉的人员可用，罗丹一会儿做信息员，一会儿调车，一会儿统筹物资，自己也有点混乱，“很多时候志愿者来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无法安排更多责任的工作给他，只能靠自己。”物资入库由志愿者登记后往里搬就行，出库则很重要，出哪些东西，发往哪里，都要由张国远和罗丹确定。除前线小组外，还有其他渠道包括不认识的人打来电话提供的需求信息，需要判断真假和缓急才能确定发货。第一二批货并没有特别完善的手续，幸好那时货还很少，去的地方也很单一，罗丹自己心里记清楚了，回头补充记录。后来邢陌帮着做了个出库单，加上了日期和提货人电话，清晰方便了许多，每一批物资出库都要有张国远和罗丹的签字，到达灾区后要有当地



联合办公室与灾区儿童过“六一”儿童节

接收人的签字盖章。这对后来应对警方的财务检查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这样，在最初的手忙脚乱中，一批批物资通过他们的手送往灾区。5月24日，邢陌带领志愿者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市汉旺镇。绵竹市救灾物资中心总指挥、副市长张滔听说这是一个NGO的联合行动，对邢陌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你们。

前线小组

前线人员每天一早奔赴各个灾区，把物资带去，再带回新的需求信息。除药品是主打外，从最初的水、食物、手套到帐篷、彩条布、大米、奶粉等，前方的物资需求每天都在变化，由于前线小组的及时反馈，物资几乎没有积压。

担任这个工作的，是贵州来的五个人，他们是贵州民间震灾救援联合行动小组派出的先锋部队。

地震当晚，乡村善治中心、绿家园、西西弗书店、大山助学会等贵州本土20多家民间草根NGO就开会商议联合救灾，这是继年初雪灾后的第二次联合行动。他们很快制定出明确的行动方式与合作方式：由前线小组负责每天了解灾区需求信息，后方总部负责募集物资。需求信息传到后方，这边要马上组织物资和车队运送。

13日甘泉从铜仁赶回贵州，随即加入前线五

人小组。因为有灾害管理经验，甘泉当队长，另外还有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两人，绿家园一人，另加一位退伍兵志愿者。当晚他们带着几车物资驱车成都，14日早晨9点到达联合办，稍作休息后，便奔赴第一站彭州，开始了紧急救援阶段的连轴转。

每天跑完灾区回来，大家都要开会沟通

当天的情况，确定明天的方向，往往凌晨3点才能睡觉，睡3个小时后，接着起来进行第二天的工作。吃饭，早晨在车上随便塞点儿，中午进了灾区口罩就一直不取，晚上回到成都才能真正吃上一顿饭。这中间还出了件事。16日那天回到成都，又热又累，大家喝了些冰啤酒。晚饭后队员邓华就开始拉肚子，把大家吓坏了，生怕他在灾区染上什么。第二天大家休整，逼着邓华去医院检查。医院里对拉肚子这种症状的人，一挂完号马上就送到疾控处备案。大家猜可能疫情已经出现。后来诊断邓华得的是肠炎，才让大伙松了一口气。

那段时间全国迸发出空前的救灾热情，大量人、车涌入灾区。有人开着奥拓带着少量物品也往里跑，一时间堵塞了救灾通道，所以后来开始限制车辆。“当时跟彭州市临时指挥部要通行证没给，就不管了，车上贴着贵阳市红十字会的标志，硬闯。”前线小组中因为有意气风发红十字会（这是一个注册于红十字会下面的NGO）人员，大家身穿有红十字标志的衣服，顺利前行。再加上还有一位退伍老兵志愿者，与部队联络也很便利。前线调查人员的搭配的确非常重要。

需求信息除了由联合办公室发布外，也会随时传到贵州后方，后方则两天之内就能组织物资运抵灾区，这全靠两个贵州车友会志愿者们的日夜兼程。这些车友都玩赛车，也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各种车型。车友会内部排好了班，随时准

备出发。贵阳到成都900多公里，开车大约十几个小时，紧急救援时每天至少提供十五六辆越野车，如果有体积大的物资如棉被等，则会加一辆五六吨的卡车。每车只有一个人开，到达成都后在联合办中转一下又开往灾区，效率极高。车队中还有专业救援人员，曾经从受灾惨重的银厂沟一个岩石夹缝中搜救出8名幸存者，还从一个完全被山石封闭的寨子带回200多村民。

灾区的受灾情况那么严重，到处是一片混乱，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地分辨需求？甘泉说他们的经验是从部队入手，先满足军队的需求，因为军队也是服务灾民的。野战医院需求量不大，但肯定是最实际和真实的，比如药品和妇女用品。甘泉曾和同事开玩笑，后来能在彭州设立安置点，是靠卫生巾打通的。

彭州主要由济南军区负责救援，5月12日下午4点就开拔，只带了些干粮和急救药品，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能够救出来的都已经救出，战士们开始生病，而外科用药对痢疾腹泻感冒发烧没有任何作用，药品需求就会转到内科或者防蚊虫类，他们是没有准备的。15日给部队送药品时，甘泉他们还送去了一车蔬菜。因为部队不能随便接受群众的东西，当时还想着如果不行，就象征性地收一块钱，但是送到后战士们很高兴，好几天没吃到一口蔬菜了。17日再去送药品时，才看见济南军区发来的蔬菜。

作为前线小组，除了每天奔波外，还要多承受一份心理上的考验。第一天从彭州回成都时，还带回两名幸存者，地震当时他们因为在田里干活而幸免于难，但其余的家人除了女儿在外面打工外都死了。两人一上车就不停地哭，甘泉他们谁也没敢问。贵州乡村善治中心是一个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NGO，甘泉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队员中一个做心理医生的女孩去了北川后几乎崩溃，她在学校差点踩到一个死尸的手，回来一闭上眼就看到很多人对她说救救我。在大家的帮助下，她好不容易才慢慢调整过来。

为了安全，五人小组出去时从不分开。11天里，8个重点受灾县他们跑了7个。甘泉本想去茂

县，但被五人小组“民主掉了”，一来随时有山石滚落，太危险，二来因为道路还没打通，必须绕马尔康前往，来回得5天，耗时太长。从5月25日起，前线小组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代表贵州民间震灾救援联合行动小组进行灾民安置点的建设，那以后往前线运送物资及信息收集的工作，改由邢陌负责。

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援

从联合办公室成立后，救援物资就源源不断地从贵州、昆明、广州、深圳、厦门、北京、上海、重庆甚至新疆涌入。每天收到的来自NGO、个人和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大约五六十万元；广东狮子会每天提供约15万元资金，委托联合办购买指定物资送往灾区；邢陌的“根据地”在深圳，地震后他很快联络朋友在深圳设立了物资接收点；昆明、重庆、贵州都有联合行动小组；由水瓶在成都进行联络，麦田计划佛山分社、东莞分社、汕头分社的物资陆续发来，送往前线的大量的衣物就来自他们……

厦门绿拾字成为厦门地区总协调，并发挥自己在厦门具有一定声誉的优势，用各种办法宣传为灾区捐赠物资。5月15日，一名志愿者赞助印制了1000张救灾口诀卡片和5000张募捐名片。口诀卡片上印有指导灾民应对灾害的方法，随救灾物资一同发向四川。募捐名片上则是急需的物品和捐助办法，由志愿者们发送给路边行人或亲朋好友。一对情侣接到志愿者的募捐名片，立刻跑去旁边的药店买了300多块钱的药。

5月17日，第一批868公斤药品、食物等通过厦门航空免费运往灾区。要获得运输便利，必须得到民政局开出的介绍信，但因为物资全部由市民捐赠，种类多，数量杂，无法向民政局详细列明，因此在志愿者磨破嘴皮拿到两张批条后，民政局再也不松口。5月19日，绿拾字不得不宣布停止接受捐赠，虽然民众仍然不断地送来物品，但除了药品和帐篷等最急需物资，其他物品只能拒绝。他们觉得很对不起同胞们的一腔热情。

在全国各地组织的捐赠活动中，组织者都被人们的真诚与热心打动着。

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

电影和游戏把我们宠坏了。血淋淋的砍杀当成习惯。对玩游戏的人来说，一万人又如何，数字过眼云烟。但真的把这些命铺在你面前，一个一个的或呻吟或绝望，或哭泣或死亡，没人受得了……

在四川NGO联合救灾办公室呆了一个多星期，每天看着仓库。接受捐赠、登记；入库、登记；出库、登记。有货车运来大米，扛去。相信我，那一点都不帅。一百斤一袋，比我几年前重。

十吨米，两百袋。苦笑，但几分钟以后我明白灾难复苏了人性。

“救灾的物资的嘛，老刘，走我们切帮忙搬。”起先说这话的是这样一个人，会在餐厅大肆吆喝着划拳灌酒，会在大街上赤着胳膊斥责他人，成都人口中的老超哥——但他会依旧赤着上身，吆喝着朋友跑到货车边径直扛起一袋米。

在成都的临时自行车停放点很容易看到这类大爷，他们会为了你偶尔没有的两角零钱用一些恶意的话中伤你，他的老伴每天在你身边转悠，会为了一个矿泉水瓶和人红着脸争执——大爷扛着一袋米，他的老伴——手里依然提着搽水瓶的袋子——搀扶着大爷往仓库走去。

两个在街边玩滑板的年轻人，隔着几百米你就会感觉到那些招摇和张扬的个性——有点犹豫着凑过来帮忙，居然不懂中文，日本人。

颇感动人，整个场景。我们懂得感恩。

所以我愿意继续呆在仓库做事，期盼，去一车，救一个，好一个。

这是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志愿者，留下的一段文字。

来来去去的志愿者，发自天南地北，有律师、商人、学生，甚至七八岁的小女孩。老陌（大家这样称呼邢陌）当初在深圳义工联是五星级义工，也是国内第一个被派往非洲的义工。地震后两天内他安排好学院的事务，并在深圳联络设立了两个物资接收点后，15日赶到广州。现在，如果你问晒得很黑的老陌负责什么工作，他会高兴地说：当搬运

工，而且当得很出色。让罗丹佩服的是，身为院长的邢陌只把自己当普通志愿者，听从着自己的指挥去扛大米，而且不知从哪儿找来十几个老外，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去分发物资，他拿回来的单据也最完整：详细写明物资种类，要当地人不仅签收，而且正而八经打出来，或者重新抄一遍，签名，盖章，日期，一样不少。

许多人是想来上前线的，当知道那里的人们缺水缺粮后，就留下来默默地搬东西，每天卸货，出货，清点，一千十多天。一袋大米100斤，他们搬了400多袋，还有800多箱矿泉水和奶粉，近500顶大小帐篷，无数药品……

后来，路上行人看见了，纷纷跑来帮忙，扛完走人。

有人会突然送来几箱水或吃的给志愿者，或者买来物资，扔下就跑，根本不给你问他名字的机会。

晚上志愿者睡在楼下值班，人们会烧好开水送来。

知道送货需要车子，一些做物流或家具的公司说我有卡车，还有朋友，朋友的朋友。罗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先生。有一天特别热，他从仓库外面过，看见那里忙碌的场景，知道是为灾区募集物资，赶紧回家和爱人买了四五箱水给志愿者，也不肯签名，放下东西就跑。罗丹追上去请他留下一个电话，他稍作迟疑后终于同意，并说自己有卡车，如果需要随时打电话。后来，还真的用了他三辆车，但仍然只知道他姓杨，做家俬。

出问题了

5月16日，《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特刊》上的一条消息把大家都弄懵了：联合办在成都的协调人由张国远变成了陆非和安猪，而物资筹集由罗丹变成了“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薛启婵，联系电话也变了，怎么回事？正在广州开会的陆非和安猪赶紧飞往成都。

当初大家商议进行联合救灾，其中一项工作由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的老卢和张丽娜承担，就是每天收集相关信息发布救灾特刊，内容不仅有联

合办的，也包括其他民间组织的救灾行动。可问题是，老卢和丽娜看到四面八方不断发布的信息，唯独联合办每天只更新一次，那还是罗丹忙得刚能喘口气的时候，半夜3点趴在电脑上写的。罗丹苦笑，14日联合办公室的工作开始启动后，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随时有物资来，有电话来，有人来，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再也停不下来了，根本没人能抽出时间发布信息。办公室里3台电脑一直有人用，却都不是执行团队的人。守着NGOCN上的救灾专版进行信息统筹的陆非也着急，各种信息奔涌而来，就是没有联合办的。为什么没有设立人手专门负责与后方信息沟通？总协调张国远承认，当初考虑的就是效率，没有提出成文的决策机制和行动守则，许多决定是临时的，成员之间也缺乏信息沟通。这一点与“5·12中心”相比就有所欠缺，那儿很快就制定出相关的规则，有专门的小组负责进行信息编辑和发布，也有专人接待来访人员，因此运行多日没出现过这样的混乱。

陆非给执行机构和老卢他们打电话，原来问题出在QQ群里，不知谁在上面把协调人和物资统筹的人名电话改了，而办公室这边又没有专人负责消息传达，特刊自然就出了问题。

5月17日深夜，陆非和安猪赶到成都，大家都在旅社里等着他们。这还是联合行动以后，前后方第一次真正坐下来敞开心谈。17、18日大家连着开了两天会，分析所遇问题，设立相关制度。20日招募到一名信息专员、志愿者黑木，之后再没出现信息混乱的情况。同时，本来就在ICS任会计的水瓶于19日正式开始管理财务。

一场小风波很快平息，那之后，联合办继续全力开展震灾救助。

又出事了

5月24日，几名警察神情严肃地出现在办公室，要求张国远跟他们走一趟。

那是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处的刑警，他们接到举报：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

NGO在国内的生存环境本来就如履薄冰，对

于这次联合行动，大家考虑过风险，但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大家都想尽一份力。将办公室设在根与芽，也因为这是一个正规注册的机构。而且从一开始大家就明确了，联合办的功能只是进行信息沟通、物资委托转运，以及为大家的救灾工作提供协助，不进行资金募集。

但执行起来情况就开始变化。从5月15日到24日广东狮子会共打来87万多元，委托联合办购买指定的物资运往灾区。联合办公室只是临时机构，没有账号，出于对张国远的信任，钱都是打在他的私人账户上。此后自然之友、上海东方艺术学校等机构或企业的委托项目款、包括狮子会支持联合办的2万元行政费用，都在张国远的户头上。

面对警察的询问，张国远谨慎回答：我们不是接受捐赠，而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把大家的善心送达灾区。警察把办公室的财务仔仔细细查了一遍，也查了仓库，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夸水瓶账做得好，如果水瓶去攀枝花，还要请她吃饭。

但即使这样，警察仍然要把张国远带回攀枝花。“当地政府要求我回去做个解释，为什么钱会到我私人账户上。”“区政府是一直在保全我们，但因为当时也有政策，不允许除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之外的接受捐赠，他们压力也很大，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后来我想如果辞去原来机构的所有职务，这件事情就好解决了。”于是5月30日正式登报公示，张国远辞去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的职务。那几天，联合办的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大家的心都一直悬着，一会儿说要回来了，一会儿又被带回去，直到29日张国远回到成都。

《南方都市报》后来的报道《草根NGO：非常时期的爱情》，开头就是这件刺激人神经的事儿，一时间还让人们有不少猜测，是不是国家在控制民间救灾力量。按张国远的说法，其实气氛没那么紧张，整个调查过程并不在审讯室，而是在随意的环境里，一边喝茶一边谈。

解散了，这很正常

6月初，网上突然传出香港《苹果日报》的报



NGO备灾中心在汉旺的工作站

道，称这次赈灾中“最大的NGO”——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近日被迫关闭”。

先不管《苹果日报》是否出过这样一篇报道，也不管其中明显的错误，比如说“NGO联合救灾办是由著名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倡导成立的”，但这样的信息的确让很多NGO担忧起来，联合办也的确遭遇过警方的调查。有人开始发表文章表示对政府的不满。

这状况让两个赈灾联合机构着急起来，本来民间组织的处境就不佳，加入救灾一是希望关注政府顾不到的问题，拾遗补缺，二是希望政府能够看见他们的作用，以改善NGO在国内的境遇。可现在一弄不就搞僵了吗？实际上5·12中心并没有解散，除了在5月30日以后不再进行每日例会外，作为NGO间信息平台的功能仍在发挥，并且正在筹备将中心变成一个长期项目来运作。而联合办早在5月22日张国远被警方调查之前，就在网上发布：将于5月30日停止运作，5月25日起停止接受物资。其实联合办运行一个星期后，他们就意识到紧急救援阶段很快会结束，下面会进入灾民安置与社区重建。

让罗丹高兴的是，一向很难协调联合的NGO，这一次能做得这么好，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张国远分析，NGO都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目标和使命，有不同的行动方法，平时很难联合行动，这次能有这样的表现，其实是因为在紧急救援阶段，大家的目标都相同，就是尽己所能支援灾区；而过了

这个阶段，面对灾区不同的需求，大家又会回到各自擅长的领域，分开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

实际上，紧急救援并不是NGO的强项，但前期的介入却为下面进入社区发挥特长做好了铺垫。比如绵竹汉旺镇武都村要修大约1万套安置房，安置三万灾民，肯定有大量的社会工作需要民间介入。邢陌在运送物资时和当地政府及村民建立起良好信任关系，这就为后来张国远的NGO备灾中心进入那里工作打下了基础。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从5月13日成立，到5月30日宣布解散，共向灾区运送了价值约1000万元的物资。每天进进出出约五六十万元的货，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物资外，还往绵阳和江油发去了狮子会捐赠的12座流动厕所。

这样的成绩，他们定位的准确与迅捷的行动力，让一些没有参与的NGO人士称赞，罗丹却说遗憾比自豪更多：许多事情在大家的能力范围之内，却出现差错，应该做得更好的，为什么没做到？还是太急了！可是，如果没有这毫无经验、手忙脚乱的第一次，又怎么可能有下一次的从容与娴熟。从这一点来看，这次联合行动的价值应该是双重的。

紧急救援虽然结束，但大家的生活轨迹无法再回到从前。张国远已不再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他和NGO备灾中心在汉旺，希望把那里做成一个社区中心，为其他做心理健康、医疗、儿童教育等工作的NGO进入打好基础。甘泉他们的贵州联合行动小组在彭州地区建立了一个固定安置点和两个临时安置点，同时派遣志愿人员前往安置点提供灾民生活及心理服务。罗丹、邢陌、水瓶代表着各自的机构，与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起，在龙门山镇开始了“新家园计划”，要做志愿者培训，尤其是村民和村干部；要做社区实验，和灾民一起，在他们恢复家园的同时，恢复一个社区……

那似乎就像一束花，五颜六色四散开放着，因为某个原因，被扎在了一起，同时，他们的根一样还在四面伸展，深深地扎在受灾的社区中，与那里的人们一起度过，一道前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公民社会中心 供稿）